

(上接 5 版)

2019 年全国书店净增约 3500 家

# 实体书店为何“弯腰扁担不断”

疫情期间,以单向空间为代表的众多独立书店,发出求助信,希望众筹续命。更多的实体书店,则依靠打折卖卡、福利盲袋、线上读书会等活动,加上直播、外卖等新的销售方式,以期度过寒冬,努力存活下去。

相比之下,这些进驻大型商场和热门商圈的实体书店,即使在疫情期间,仍有新店扩张,且占地面积大、室内装潢美、时尚到炫目,迅速蹿升为“网红”打卡之地。

本报记者 尹平平

“我拍了那么多张,就没一张你满意的吗!”小伙子忍不住冲拉长脸皱着眉在手机上划来划去的姑娘嚷了一句。

这是一个普通工作日的下午,在北京西单商圈的一家“网红”书店内,拍照的人不少,翻书的人很少。

在硕大的环形书架前,在供读者小憩的座椅上,在嵌刻名人名言的装饰墙边,姑娘们时而把身体扭成 S 型,时而用纤纤玉指轻抵下巴,露出楚楚可怜的神情,时而用手轻抚超短裙下那节雪白的大腿……

店员似乎对这些“读者”视而不见,卖力地搬书理货,或搭梯子把书摆上五六米高的书架上。有时他们也不得不穿梭于妆容精致的女士中间,客气地提醒一句:“请戴好口罩,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

受疫情影响,商圈内不少商铺关门转租,但这家书店却逆势而行,在北京疫情防控仍未降级的 4 月开张试营业,并以其精美别致的室内设计迅速成为“网红”,吸引人们戴着口罩前来“打卡”。

记者调查发现,与之类似的“网红”书店,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全国其他城市,还有不少。

在人们印象中,近些年关于实体书店的消息,似乎更多是业绩寡淡,甚至关张歇业。听闻有些老牌书店难以为继,甚至爱书人紧急赶来买书“救场”,但基本回天乏力。

疫情期间,以单向空间为代表的一众独立书店,发出求助信,希望众筹续命。更多的实体书店,则依靠打折卖卡、福利盲袋、线上读书会



▲ 8 月 25 日,一个女士带着两个孩子在全民畅读(郎园 park 店)看书。

本报记者 尹平平 摄

等活动,加上直播、外卖等新的销售方式,以期度过寒冬,努力存活下去。

相比之下,这些进驻大型商场和热门商圈的实体书店,即使在疫情期间,仍有新店扩张,且占地面积大、室内装潢美、时尚到炫目,迅速蹿升为“网红”打卡之地。这种反差,不免令人困惑。

公开数据则显示,书店的日子似乎没有那么“糟糕”。据《2019-2020 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显示,2019 年我国新开书店数量超过 4 千家,关闭的书店则为 500 多家。

相较于《中国餐饮报告 2019》披露的,“2019 年我国每天有 8219 家餐厅倒闭,已关闭餐厅平均寿命仅 420 天”,实体书店行业的数据并不难看。

记者梳理政策了解到,目前全国已有 28 个省区市,出台了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举措。以北京市为例,在《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资金管理办法》《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资金项目管

理实施细则》《北京市各区实体书店房租补贴标准》等政策利好下,2019 年,北京市 143 家书店得到房租补贴,共计 5300 余万元,同比增加 30%,极大缓解了经营者的生存压力。

在去年年底举办的北京市 2019 年最具影响力书店、最美书店、特色书店颁奖活动上,北京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0 年北京将继续加大对实体书店的扶持力度,落实“实现一区一书城”“建设 200 家特色书店”和“打造 15 分钟阅读圈”等发展目标。

2 月 26 日,北京市委宣传部下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做好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工作的紧急通知》,将加大扶持资金力度,加强对实体书店在房租补贴、贷款、担保、税收等方面进行支持,并推动各区结合本区实体书店存在的具体困难,有针对性地给予书店扶持。

在这一政策支持下,截至目前,西城区有 34 个实体书店项目获得资金奖励,扶持资金

近千万;朝阳区设立 100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实体书店恢复经营;海淀区启动实体书店扶持评审工作,宣布本次补贴资金总额高达 2000 万元,在区内已有 153 家书店的基础上,年内计划新开 116 家实体书店……

国外同行也觊觎中国的实体书店市场。

8 月 12 日,2020 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首日,日本茑屋书店即举办发布会,宣布其位于杭州的中国首店将在 9 月开业,上海店将于 12 月开业,西安店暂定明年 3 月开业。早在今年 4 月,茑屋投资(上海)有限公司项目拓展部负责人何军曾透露:茑屋书店计划未来在中国开出 1100 家书店,单店选址面积在 1500-3000 平方米。

在今年 1 月召开的 2019 中国书店大会上,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副局长董伊薇表示,我国实体书店已迎来发展新机遇和做大做强的“窗口期”。

编辑 黄海波

## 核心商圈开书店,靠什么赚钱?

本报记者 尹平平

如何重新认识实体书店“网红化”等现象?除了政策支持,还有哪些力量在吸引实体书店复兴?实体书店的“造血”能力靠卖书吗?……

带着这些问题,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对话新华出版研究院院长程三国。

程三国是中国期刊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图书商报》的创始人和原总编辑,长期从事有关图书出版业的商业模式、价值链、经营及管理的观察与研究,主导编撰历年来的《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

### 只拍照不买书,也有积极意义

记者:实体书店复兴,扶持政策是最主要原因吗?

程三国:政策引导是一个原因,商业吸引本身才是根本原因。政策性的补贴都是事后补,等书店开出来再补贴,因此不是前提。频频有人进入实体书店行业或者重装扩大实体书店的规模,说到底,还是商业方面的吸引力。尤其是在热闹商圈开书店,无论租金还是装修成本,投入都不小,没人掏钱买单,肯定办不起来。

记者:开在核心商圈的书店,怎么才能消化前期投入成本?

程三国:这些书店不少是商业地产主动招徕入驻的,在一段时间内,场租不要钱,装修设计的钱也由他来出。书店方面只需要负担书和员工的费用,以及后续的运营成本。如果有能力的书店经营者,能够将装修成本控制住,甚至在装修过程中就可以挣钱。商业地产商看好实体书店的到来,能为他挣到更多钱。

记者:实体书店如何打造商业吸引力?是把书店装修成“网红”风格吗?

程三国:在网络时代之前,买书只能到书店去,因为只有那里卖书。现在购书的途径太多了,尤其网购不光方便,价格也有优势。书店的吸引力变了,成为一个文化媒介,具有传播属性。

移动社交媒体时代,如果书店做得足够漂亮,成为“网红”打卡地,让每个来的人都想拍照发朋友圈晒图。通过这种途径,能够将书店的形象传播出去,重塑书店的吸引力。

对于任何实体商业体来说,吸引客流都是前提基础。如果开在商圈和综合商业体当中,前来“网红”书店打卡带来的客流量,就不仅惠及书店,还能分享给其他商家。所以商业地产才看好实体书店,愿意投入支持实体书店。

实体书店“网红化”,也不一定是从业者主

动就想让书店变成这样,而是在目前中国整体的商业背景、消费背景,以及文化潮流的影响下,必须要呈现出的一个形态。因为在更大的商业循环当中,需要“网红化”的实体书店,那它就以这种“网红脸”的形象和定位站出来,满足这种新的需求。

记者:可是被“颜值”吸引来书店打卡的多数人,似乎只拍照不买书,这是书店所期待的氛围吗?书店仍能从中受惠吗?

程三国:在这个手机占用了人们主要注意力的时代,爱读书的人在变少,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有些人虽然自己没买书,但是愿意到书店拍照、发朋友圈,至少表达出对读书的一种向往,说明他们内心中还是尊重书香文化的。

即使只是为了拍照,他们的到来,让书店这种文化场所有了人气,本身也是在塑造一种崇尚阅读的文化氛围。

通过人们到书店来拍照打卡发朋友圈,把书店的形象传播出去,把人吸引来,来的人当中总有人会看书,总有人会买书。只卖书的书店,现在也没法生存。书店也卖文创产品、咖啡和其他服务。这些都能为书店带来收入,而且毛利率都比卖书要高。

记者:在有的书店里,咖啡座和文创产品的占地面积远超书架。实体书店只有这样才能经营得好吗?

程三国:经常会有人抱怨:现在的书店不像书店,更像咖啡馆、文创店,怎么能这样呢?书店从业者也很纠结:我们也想纯粹,但是一算账,为了活命,必须要做点文创,卖点咖啡轻食,搞些活动。

我总是为书店抱屈:那些谴责书店不够纯粹的人,想必是爱书的人,但也未必会在实体书店买书,更别提只在实体书店买书。多数人还是会去网上买书。既然自诩为爱书人的你,都不一定去实体书店买书,你让实体书店怎么能只靠卖书生存呢?

政策资本双双“输血”,实体书店仍难“造血”

记者:政策对实体书店的支持,想必是看重书店的文化属性。但具备文化属性的场所很多,为什么偏对实体书店如此倾斜?

程三国:书店作为一个文化场所,受到各级各地政府的格外重视和支持,主要是因为它惠民。

和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图书馆等其

### 疫情不会给实体书店带来灭顶之灾,网购才会

记者:疫情期间,很多实体书店都在积极自救,通过直播搞线上读书会,用微信公众号推销会员卡充值,叫外卖上门送书等各种营销活动,救助效果明显吗?

程三国:肯定有效果,但不太大。

网络营销需要一个服务体系,从选品到陈列,从供应链到客服,都有很高的要求。在此之前,很少有实体书店有这个基础,疫情期间很难临时搭建起来。

有些实体书店搞了会员盲盒、卖会员卡等活动,虽然带来一些收入,使现金流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实际上是在透支未来的营收额,相当于寅吃卯粮。

至于直播带来的收入,就更有限了。你只能看到书店告诉你,有多少人参加他们搞的直播活动,而很少提到销售额有多少,因为太少了,不好意思说出来。

直播不适合实体书店行业。现在直播销售都是要有价格优势才能吸引来流量,但书店是产业链的末端,定价的回旋空间很少。即使真的出现哪本书因为直播卖爆了,实体书店甚至不具备供货能力。

记者:疫情会拖慢实体书店复兴吗?

程三国:会有影响。例如原本想要进入这个领域的店家,可能会因此犹豫。不过疫情终究不是常态,也不会为这个行业带来灭顶之灾。真正持续威胁实体书店行业的,还是电商平台的折扣冲击。

我们国家一直没有针对图书定价体系的法律约束。网店打折售书的力度,是实体书店永远无法做到的,也是实体书店永远的痛。哪怕很多爱书人,专门逛书店,看到了喜欢的书,也会因为价格差异,习惯性地上网购买。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只有从法律层面制定图书定价保护机制,使图书销售价格得到专门的法律保障。

自 20 世纪初开始到今天,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国外图书出版业发达的国家多先后制定了图书价格的管理机制——无论在哪里买书,价格上都不会有太大区别。也正因此,徜徉在这些国家的大街小巷上,你才会动不动偶遇历史悠久的特色书店。如果我们国家也能有相关的制度保障,或许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实体书店目前面临的种种被动局面。

编辑 黄海波

### 生态保护能预防就不去追惩

2013 年底,一次绿汁江河谷季雨林调查,让顾伯健成了绿孔雀生存危机的“吹哨人”。

这位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生,留心到当地老乡频繁提及的绿孔雀和计划建设的水电站。

“由于半山适宜盖房耕作,绿孔雀栖息地被压缩到河谷地带。水电站一旦建起来,就把栖息地淹没了。”顾伯健曾为此多方反映,但收效甚微。

直到 2017 年 3 月,此事引起云南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的注意。“云南人印象中孔雀很普遍,连我这个野生动物摄影师都是这种感觉。”虽说早在 2000 年,他也曾拍到过绿孔雀,却没引起过多关注。

“忽视绿孔雀这么多年了,感觉自己非常失职,只能努力弥补。”他开始四下呼吁,保护绿孔雀“最后一片完整栖息地”,并联合“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给当时的环境保护部发出停建水电站的紧急建议函。

期间,由新华社记者采写的两篇报道,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

同年 7 月,“自然之友”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水电站建设将淹没绿孔雀栖息地为由,把“新平公司”、总承包方及受托编制环评单位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此外,由于在水电站环评审批时,淹没区内的陈氏苏铁,尚未被列入世界苏铁名录。环评既未对其进行评价,也未采取保护性措施,因此成为案件争议焦点之一。

在“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看来,“环评手续盖章的都盖了,但珍稀物种竟没引起重视,属于重大疏漏。”

“绿孔雀案的标志性意义在于,突破了有损害才有救济的传统理念,过去这类诉讼几乎都是事后,这次提升至事中甚至事前,可以减少或避免生态环境遭受损害。”在北京北三环外的华龙大厦办公室里,张伯驹告诉记者。

“生态系统一旦遭到破坏,往往是不可逆的,重要生物可能区域性灭绝。赔偿几亿甚至几十亿,也无法恢复以前的样子。要治病于未病,能预防就不去追惩。”张伯驹说。

1984 年出生的张伯驹,回忆刚工作时,眼见一片森林被砍伐,在现场哭一场,却解决不了问题,无力感很强。

有段时间,他曾辞职去读书,希望从公共政策角度看待环境问题。“解决问题不只是用对抗的方式,环境问题本质是公共物品的管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如何通过多方有效博弈,尽量把外部负面问题最小化。”张伯驹说。

从有争议的环评报告,到沉默的专家群体,从慷慨激昂的环保人士,到措辞谨慎的地方官员,人们围绕“云南绿孔雀案”的不同态度,呈现出多元的利益诉求。

聊起吃水问题,李兴贵指着平房上的水塔对记者说,水是从 26 公里外的哀牢山引过来的,“这 10 年天气太干燥了”。

“村民只能种烤烟等抗旱作物,如果水电站建起来,取水更方便,土地利用率会提高,气候也会湿润些,能给群众带来好处。”祁芸说。

对于人口不足 30 万,以采矿、冶炼为主要产业的新平县,这样的大型项目对县域经济发展同样重要。“新平没什么出口产业,消费人口基数小,经济不发达,主要靠投资拉动。”一位当地干部坦言。

王定周初步估计,受益于水电站的老百姓,光新平就不少于 5 万人。

“个人角度看,水电站利大于弊,能解决下游防洪、灌溉、饮水问题,周边村民可以发展种植、养殖。”据王定周介绍,戛洒江水电站在新平上缴耕地占用税、植被恢复费共 3.8 亿元。

### 即使工程下马善后也很棘手

日前,记者来到新平县水塘镇,在临街一栋外墙无标识的楼房,找到“新平公司”的办公场所。附近的超市老板说,平时楼里还有人进出。

不远处的嘉诚酒店 3 层外墙,还挂着“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的横幅。资料显示,这家公司曾签约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

“他们退租 2 个月了。公司人多的时候,租了六七间房办公,现在里面都空着。”嘉诚酒店女老板说。

2018 年,云南省发布生态保护红线,覆盖水电站淹没区大部分区域。“生态红线是不可调的,这个项目往下建设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赵兴有说。

戛洒江水电站早在 2006 年就已立项,此后经国家与省级相关部门层层审批,直到 2016 年导流洞工程开工。

据王定周透露,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新平县就在戛洒江规划了 3 个梯级水电站,其中两座因种种原因取消。

过去,为保障电力供应和西电东送,云南加快小水电开发。新平县有 1 江 32 条河的小能资源,陆续建起 20 多座小水电站。

“云南生物多样性太丰富了,随便砍一片树林都是好地方,开发时很容易造成生态破坏。”张伯驹说。

一审中,“新平公司”辩称:“水电站极有可能无法继续建设,因此原告起诉的前提不复存在。”

张伯驹向记者透露,对方在二审中仍坚持这个意见,“但拿不出事实证据,也没有提供划入生态红线的相关行政文件,声称无法建设是大概率事件。”

对此,张诚民向记者解释说:“生态保护红线由原来环保部门主导,现在移交给自然资源部,当时生态红线的评估调整,要出台具体的管理办法,包括正面准入清单和负面清单。目前,红线内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很多管理内容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张伯驹认为,“如果真的证明没法建了,败诉我们也没办法。不能口头说,没有任何事实支撑,就让我们撤诉或判败诉。”

在他看来,如果水电站能永久停运,对绿孔雀栖息地的影响没那么大,“毕竟还没做大江截留,也没做清库蓄水。”这正是预防性公益诉讼对生态环境事前救济的价值所在。

</div